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农业发展论坛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主编 牛若峰 副主编 陈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论坛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804 000

印 张：33.5 插页 1

版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3 000

书 号：ISBN7—300—01833—5/F·513

定 价：24.50 元

编 者 的 话

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部书是199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荟萃，由此而得名：《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论坛》。

论文的作者是海峡两岸著名的农业经济专家学者和对中国农业颇有研究的海外著名学者和中国留学生。

由于篇幅所限，《论坛》从作者提供的76篇论文中选入59篇，入选率为84.2%。鉴于多数论文篇幅偏长，为节省版面，在无损于论文主题完整和观点本意的前提下，我们对部分论文作了段落的取舍和不同程度的删减，并删去一些图表和所附参考文献出处的说明。考虑到本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大陆读者，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根据作者的原意，依照大陆的规范，对一些论文作了若干文字调整，请作者们宽谅。

《论坛》按论文主题分成十一个部分，依各篇内容的相近性聚类分编。除个别文章使用摘要外，均选用原稿。由于有些论文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可以编入这一部分，也可以编入那一部分，所以本书各个部分的划分和编排是相对的。

《导论》是我们根据论文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写成的。应当承认，要对各抒己见、涉及面很广的讨论作出全面系统的概括是困难的，《导论》中18组观点仅是从论文中抽出的部分观点，未能囊括全部观点，更未涉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因而只能是一个挂一漏万的粗略概括。加上编者借题发挥，可以算作一个供参考的助读线索。

本书适读面广，可供高等院校师生、科技人员、经济管理干部、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们阅读参考。

这次编辑《论坛》，没有成立编委会，也没有设立工作班子，在短期内结集成书，确实并非易事。我们十分感激各位作者把自己的论文奉献给广大读者。有关单位的一些青年学者为《论坛》译校了英文论文，有的同志协助我们作了一些技术处理，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工作量很大，加以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作者、读者和有关领导指正。

1993年2月15日

序 言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我们的祖先以其非凡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整套有效的适应古代环境的农耕技术，曾以东方型传统农业文明称著于世，使中华民族绵延壮大数千年。

20 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国传统农业经营面临效率的考验，显现出它的弱点，而在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也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和调整。自本世纪 50 年代初起，海峡两岸的农业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看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但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产业地位不会改变。反映社会经济进步的一系列基本目标，诸如增进有效供给，保障社会安定，改善生活环境等都在决定意义上有赖于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过去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为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初步基础。我们在体制转换、政策调整、技术改造、资源增殖和环境保护方面还面临许多新问题，必须深入探索加以解决，才能加速海峡两岸的农业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大陆，有 11 亿多人口，9 亿生活在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陆农村多数人仍将就业于农业产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绝大多数人口更是依靠农业谋生。发展农业，对于保障人民食物供给，实现城乡工业化，保持社会安定和发展对外贸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农民收入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总产量达到 5 亿吨，食物结构需有明显的改善，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此，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加速建立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须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农业技术改造。中外经验证明，体制变革与适度投入、技术进步相配合，才是加速农业发展的成功秘诀。

在这个经济环境快速转变的新时代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如何立足于本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寻求一整套适合现代潮流并能促进城乡工业化和农民富裕的农业发展政策？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根据社会市场需求的变化，如何加速农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质量提高，以更积极、有活力、高效率地发挥基础产业的作用，使农业能够适应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要求？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台湾作为独立关税区“入关”）以后，如何最佳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兴利除弊，既能有力地迎接新的挑战、参与国际竞争，又能有效地利用新的机遇、依法保护和发展本国农业？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里，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

进，任何重要政策的出台或变动都将在国际上产生互动效应。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有获得潜在利益的机会，又要受到相应的制约。面对这些很富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有适当的策略，充分的配合，才能克尽全功，于底有成。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1992年8月在北京召开“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学术讨论会”，集中海峡两岸知名农业经济专家学者和海外著名学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的智慧，深入研讨农业“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有关问题，寻求可供选择的答案。《论坛》一书荟萃了与会专家学者提供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是来自台湾的专家学者亲如手足，都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著文立论，各抒己见，为振兴中华农业献计献策。参加研讨的国外朋友亦然，针对中国农业发展政策和前景，提供了良好而直率的建言。海内外众家合作，讨论层面之深广，分析之透彻，论证之充分，都是空前的。《论坛》中许多论文内容丰富，构思新颖，资料翔实，贵在融学术性、政策性和方法论于一体。许多独到见解，富有哲理，发人深省。

《论坛》问世表明，使更多的人掌握解决问题的方略和促进农业发展的知识，至关重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正在经历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且后继有人，加以海峡两岸有多层面的互补性，一定能够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时代重任。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对现代化有强烈的追求，她既能富，也能强，必将以不负祖先和后人的富强者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何 康

1993年2月15日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部分 综论 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农业发展.....	(刘志澄) (13)
中国的农业发展：过去、现在与将来.....	(陈希煌) (20)
中国农业发展之成就与前景.....	(赵冬缓) (31)
80年代中国农业的增长与农产品供求格局的改变	(段应碧 戴小京) (40)
中国工农业关系及其前景展望.....	(牛若峰 郭玮) (47)
中国存在粮食问题吗.....	(盖尔·约翰逊) (54)
200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向	(达尼洛·托米克等) (63)
从全球看中国的农业发展	(D·万代·门斯布鲁格等) (71)
2000年的中国农业：单一政策改革与消费变革的比较	(波莱温·狄克西特等) (77)

第二部分 食物需求与消费

中国食物消费、需求和对策.....	(梅方权 蒋建平等) (87)
中国食物配给和需求.....	(陈文雄 王桂景) (96)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给、消费和储蓄行为	(王直 简·金赛) (112)
台湾农产品需求与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萧清仁) (122)

第三部分 土地使用制度

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村土地制度	(韩元钦) (139)
台湾的土地改革及其对经济发展之贡献	(毛育刚) (146)
中国农户经济的增长与规模经营	(顾焕章等) (150)
中国的土地合同制	(弗·科鲁克) (158)
中国农村改革后的基层决策：合同与选择	(斯科特·罗泽尔 梁恒) (163)

第四部分 农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

- 关于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初步研究 (万宝瑞 周应华) (175)
- 总要素生产率与农业发展 (冯海发) (184)
- 中国农业技术系统障碍因素诊断 (朱希刚等) (194)
- 中国农业研究和生产增长 (樊胜根 菲利浦·G·帕蒂) (201)
- 台湾农业知识投资报酬率之衡量——生产函数法 (史济增 傅祖坛) (210)

第五部分 农业投资与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利率和通货膨胀对中国农村资本形成的影响

- (彼尔顿·M·佛来希尔等) (223)
- 农业金融对台湾农业发展之贡献 (李洪鳌) (230)
- 农业保险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刺激作用 (叶祥馨等) (239)
- 农户投资在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魏兰 潘敏玲) (244)
- 台湾和菲律宾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的区别 (摘要) (达尔·W·亚当斯) (259)

第六部分 农户收入问题

- 中国大陆农户收入增长问题 (安希伋 柯炳生) (261)
- 台湾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与其对农业生产及农业收入之影响 (许文富) (270)
- 台湾农家收入及其政策 (罗明哲) (279)
- 农民收入、农业增长与市场发育 (杜 鹰) (290)

第七部分 农业市场、价格和运输

- 广东农村的市场化变革 (温思美) (295)
- 中国省际粮食流通和批发市场 (吴 硕) (300)
- 台湾农产运销改进措施 (陈新友) (308)
- 中国农业生产在双轨制下的价格反应 (郑毓盛等) (316)
- 运输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系统 (翁·W·科 杰瑞·傅润) (325)

第八部分 农业贸易

- 环太平洋区域的农业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潜在利益 (罗伯特L·汤普森) (333)
- 农产品贸易与农村经济调整 (钟甫宁) (340)
- 政策改革对中国农业和贸易的影响 (克利斯托夫·芬得莱等) (347)
- 中国区域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多元商品空间均衡模型的应用
..... (黄淑瑛 段志煌) (357)
- 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现状与前景展望 (徐贤权) (366)
-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 (邱毅 段樵) (371)
- 未来两岸农业交流的可能模式之探讨 (段樵 邱毅) (379)

第九部分 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

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探讨	(郭书田) (385)
台湾农业与非农业劳动转移之分析	(李朝贤) (395)
乡村工业化对台湾农场劳动需求和农家收入之影响	(彭作奎) (404)
90年代中国农村就业前景	(陈吉元 庾德昌) (414)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和就业多样化	(彼得·史兰) (421)
农村非农活动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迪尼斯·哈尔) (430)

第十部分 农村人口、收入分配和缓贫政策

中国农业发展的人口政策	(陈健兴等) (443)
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与人口变化的探讨——农户生育选择模型	(陈志刚 瑞比卡·兰特) (450)
中国经济改革对农村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王卫平等) (461)
中国贫困地区的问题及对策	(严瑞珍) (477)
中国农业生产率和农村贫困	(李文彬 马骏) (482)

第十一部分 环境问题与农业发展

中国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何通维 孙若梅) (497)
台湾农业生产的环境问题与政策	(官俊荣 黄宗煌) (504)
中国发展持续性草食畜牧业生产体系的经济生态方法	(J·R·康纳等) (509)
农业持续性全球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勃布·罗宾逊) (516)

后记	(523)
----------	-------

导 论

《论坛》作为海峡两岸农业经济学界首次盛会的成果荟萃，以“深化改革，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中国农业发展的过去、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多层面的学术探讨，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是空前的。在本书许多论文中蕴含着作者的精辟思想和远见卓识，而且提供了颇为新颖的科学研究方法和不乏新意的政策建言，值得深入研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农业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资源总量规模、发展阶段、技术和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小差异；但在农户规模、耕作技艺、面临内外市场激烈竞争、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或转型等诸多层面上却有着共同的特点或相似之处。在两岸经贸合作和对外贸易中具有诸多层面的互补性。

90年代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当今形势下，农业决策必须以动态的经济分析为依据，加强农业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对于动态经济的农业决策，至关重要（陈希煌）。深入研读《论坛》众议，无疑定有裨益。

然而，一口气读完篇幅浩瀚的诸篇论文绝非易事，提供一个助读线索或许是必要的。将《论坛》分成十一个部分的详细目录可作为一个大概的助读框架。由十八组观点组成的这个导论，则可以为那些希望迅速了解主要观点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性的助读线索。需要指出的是，下面所述只是从论文和讨论侧记中抽出的一部分主要观点，我们未加评论，有的仅有所发挥，但未涉及方法问题。

（一）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要从战略观点和策略观点分别考虑

过去4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农业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变革和发展，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90年代和往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大陆在建成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情况下，成功地解决了十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台湾完成了传统农业和经济结构的改造，初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达到了富裕目标。

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任务艰巨，但相对而言，主要产品的产量目标可望实现，而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目标、产业间比较利益和城乡间交换利益的调整以及农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则比较艰难。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如果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深化改革，保证适度投入，重视科教发展，并使经济、技术和组织手段恰当配套，那末，“实现2000年中国农业的繁荣前景是很乐观的”（达尼洛·托米克等）。

一般地说，农业增长取决于资源的禀赋、文化的禀赋、技术和制度的状况。以“改革促

进发展，发展有赖改革”来概括中国大陆 80 年代农业增长和 90 年代农业发展（刘志澄），意在肯定体制变革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增长主要来自体制变革，整个农村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结构调整的贡献（钟甫宁）。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体制变革与技术进步、适度投入恰当结合，可以收到加快农业发展、实现持续增长之功效。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大陆的工业偏斜政策，往往引起农业政策变动，不仅有损于农业的稳定增长，而且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至关重要是为农民提供一个以支持农业为取向的稳定政策环境（牛若峰）。在适当政策引导下，能使各方面的因素互相配合，分阶段地循序前进逐步发展，将是实现 90 年代及其以后农业发展目标之成功良策。

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未来我国农业发展有必要从战略性和策略性观点分别考虑。从战略观点看，偌大个中国，地区差异很大，必须根据区域特点，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业区域，强化各区域的农业实力，从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国土政策观点来把握未来我国农业发展政策方向。从战术观点看，必须根据短期市场动态进行调节，以比较利益原则来规划农业生产，创造生产诱因，帮助农民赚取利润（陈希煌）。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总体智能水准^①（牛若峰），同时要秉承中国传统美德和东方农业文明中最有价值的因素，并使两者妥善地结合，这将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农业永盛不衰的基础（陈希煌等）。

（二）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农业应当协调发展，国家应对农业实行支持和保护政策

以建成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标志，根据国有工业实力和按实际购买力估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判断，中国国家工业化原始资金积累阶段已经过去，步入了中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民经济结构转换和工业内部结构转换并行，加以市场调节作用的扩大，可利用资源将加快向经济效益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而本来基础脆弱的农业还将受到资源流失的影响，因而它的增长可能是低速的。与此同时，全社会对食物的需求将继续随着人均消费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先是城市、后是农村将进入食物需求加速增长阶段。面对这个很大的矛盾，国家对农业发展必须实行保护和支持政策，务使农业保持较高的持续增长势头，竭力防止出现新的停滞。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和地方都要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总方针，在加速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同时，逐步实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切实缩小价格剪刀差，做到农业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中央和地方要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建设和涉农公益性服务部门的发展，以增强农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牛若峰）。

这些跨世纪的大目标，不可能指靠市场调节“自然而然地”来达到，只能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来实现。

（三）中国不存在粮食问题

粮食是食物的基础，无论从供给角度还是从安全角度说，粮食（含饲料粮）对于人口多、耕地少的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和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有能力在本世纪末生产 5 亿吨粮食，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只存在有关政策问题。如果以后出现粮食短缺的话，那很可能是政策出了问题。因此，中国应当稳定农业的基本政策，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把注意力放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市场为取向解决好购销、储存和价格政策问题上（盖

^① 系指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从业者平均教育程度、科学技术水平、管理和市场知识水平等素质之总称。

尔·约翰逊)。

(四) 发展饲料产业是实现供需平衡的关键

90年代城乡居民对食物的需求将迅速增加,尤其是对动物性食物的需求将强劲上升,发展饲料产业是实现供需平衡的关键。本世纪内外,制约中国食物需求增长的三个变量——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商品和劳务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呈增大压力的走向。

中国人口众多,后备资源有限,作为处于重要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因此,我国不能仿效发达国家追求高消费的模式,只能选择适度消费的食物路线,发扬东方型食物结构的优点,广辟食物来源,讲究科学营养,增进人民健康。

食物消费与生产供给和经济发展呈密切相关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对城镇居民实行粮油配给制,一方面导致其自身对收入与价格反应不实,另一方面又影响其他食物和商品的消费。国家补贴负担过重,且降低经济效益。取消粮油配给制,让居民安排各自的消费预算,一则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二则可以提高消费的市场效益(陈文雄、王直等)。随着粮油等统销配给渐成过去,食物供销和消费将越来越多地靠市场调节。研究表明,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若将非食物性商品考虑在内,则足以证明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对购买决策的影响(Dimphna Dolk-Etz等)。当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均口粮消费即稳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食物需求由数量满足转向追求质量,即要求多样化、方便化和规格化,尤其是对高质量蛋白食物的需求明显增加。台湾居民食物消费变动情况表明,个人食物消费总量和结构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而变化的趋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肖清仁)。

在中国大陆,由于不同区域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较大,各区域和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水平和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大多数农民人均食物消费质量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90年代,城乡居民对蛋白营养,尤其是动物性食物的需求将以强劲的势头持续增长,这就要求相应增加饲料粮,特别是蛋白饲料的生产供应。这是实现蛋白食物供需平衡的关键(蒋建平、梅方权等)。

(五) 创造基本条件,扩大农户规模

家庭承包制发挥活力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它应当稳定,也需要发展,长远性政策方向是创造基本条件,扩大农户规模。

由于农民人多、耕地稀缺,海峡两岸实行了大体相似的平均化土地占有制,结果形成了统一的小规模农户结构,从而在资源占有上可以防止农户两极分化,又可容纳较多的农民就业。许多调查研究表明,在正确的政策环境下,只要有合理水平的投入,小农场采用新技术的曲线与大农场相似,较小的农场能够创造比较高的土地生产率。中国大陆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促进农业迅速增长的伟绩也提供了雄辩的实证。其他举措都无法与家庭承包经营制所能创造的生产力相比拟(盖尔·约翰逊)。

台湾在50年代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地权分配合理,农村贫富差距缩小,社会趋于公平稳定,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必需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而开启了工业发展之门。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和储蓄力增强,对工业品需求扩大,从而带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毛育刚)。但是,无论台湾和大陆,均田制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也有其负面影响,主要是规模狭小缺乏竞争力,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中国大陆的土地制度经过多次变革，80年代初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以“乡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为运作体制、以家庭联产承包主要责任制模式的经营方式”（韩元钦）。

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既定条件下确实富有活力，这种责任制模式发挥活力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在条件没有改变以前，农民很难接受对土地均包格局的重大改变。此乃稳定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基本根据。然而，农户土地规模狭小，对于发展农业经营专业化、主业化和企业化毕竟是个限制因素。因此，家庭土地承包制应当发展。只有当每个经营主体拥有适当的土地规模时，才能在保持和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韩元钦）。

在小农制度下，农民收入较低，有鉴于此，台湾在70年代中期对农业实行了价格支持政策，但是未能改善农民的相对经济地位。因此，扩大农户生产规模作为提高收入的替代政策，或许是长期的且最基本的政策方向（许文富）。然而，在台湾和在大陆一样，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相当艰难，需要走漫长的路程。值得庆幸的是，大陆农村已经开创了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子，即靠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乡镇企业布局适当集中，加快小城镇建设，吸引农民离土离村，为土地集中扩大规模创造条件，逐步演进而成，而不是靠行政推进“堆大堆儿”的办法来解决（顾焕章等）。

在农村体制改革中重建的大陆农户经营，现在大多数已经或正在成长为拥有一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以及一定商品销售额的农户经济。现在农村特别需要做的是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就土地制度而言，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明确土地产权主体，建立土地流转制度（韩元钦）。同时，加强农民联合自助组织建设，务使农户经济迅速成长为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

（六）深入分析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及利益矛盾的深层原因

中国大陆农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多重问题在积累，利益矛盾在加深。许多学者深入农村研究得到的重要启示是，在中国非集中化的经济环境中，地方经济单位的决策是基于多种目标，并通过一些控制变量来实施。村干部可以隔离农户和地区以及中央决策者的联系。这样，中央的政策经过“层层过滤”，有的可能被扭曲，有的则难以落实，农民负担过重成了中国农村中的普遍性严重问题。因此，高层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经济问题”，而且也要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斯科特·罗泽尔）。深入分析农村经社问题和利益矛盾的深层原因，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需重视的新课题。

（七）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农民利益代表机构

中国大陆农民分散在广阔的农村，长期没有自己的自助组织，成为我国社会中人数最多但势力最弱的滞后群体，因而没有形成对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抗衡的力量和制约机制；农民作为农户经济的主体和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却没有自身利益的代表机构，这是极不正常的。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有力有序地走向市场，参与流通，参加竞争。因此，很有必要由农民在农村每个社区建立基层农民协会，在乡镇市县及其以上各级建立农民协会联合会，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机构。要扩大农民利益代表人物在国家和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中的发言机会和权重，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支持农民成立农协或与之相类似的农民联合自助组织，准予注册，给予法律保护（牛若峰）。

（八）加速农业技术进步

由数量型外延增长转变为内涵发展，提高总要素生产率，关键是加速农业技术进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使用新古典生产函数，把土地同其他有形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于技术进步、教育程度和制度变革对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作用，在最近 20 年来才受到愈来愈广泛的重视。80 年代以来，我国对农业生产力的研究有了一个进步：从单因素、部分生产力转变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并开始从部分生产率转变到以总要素生产率测度农业生产率的研究。

在过去 40 多年里，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的增长属于数量型外延增长模式，即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总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和贡献份额均很低。这种增长模式正好与我国不具资源禀赋优势的国情相悖。从 90 年代起，我国必须把重点转移到提高农业总要素生产率上面来，树立新的农业发展观，即“以效率为中心，效率优先，内涵发展”。从本质上说，提高农业总要素生产率主要是靠技术进步的推动，没有农业的技术进步，就不会有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冯海发）。

在我国，对于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和有很高的收益率已达成共识，但在大陆农业科学技术系统中存在许多障碍，妨碍技术进步的速度及其作用的发挥（朱希刚等）。在农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经费短缺已成为最突出的障碍。据多家研究，60 年代中国对农业科学研究的支持份额比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得多，到 80 年代，人均农业科研投资比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 1/4。而且科研资源配置很不合理，长期偏重于农作物研究，占农业总产值 1/4 的畜牧业只占用农业科研人员的 11%（樊胜根），饲料研究尤其是薄弱环节。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为其服务的农业科技事业作为公共部门的性质所决定，世界各国都是由政府财政预算负担这类公益性部门所需经费；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财政支持更是农业科技和教育培训等公益性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条件。同理，应当让农民基本上无偿或低偿地享用农业科技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因为这些公益性服务为发展商品经济带来的公共效益最终会使全体社会成员从中获益。这些领域属于政府有计划地统筹发展和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范围，并非市场调节所能为之。

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提出新的要求，农业科技系统自身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农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应当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和提高投入效率的配套技术，向农民提供优化生产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实际收入的途径或手段。以提供优质高产新品种或新组合为目标的品质育种及其配套良法的创新，应当是农业科学研究联合攻关的主要方向。农业科学应用研究要面向市场需求，其重点项目安排的超前预见性和预期成果对商品生产需要的适应程度，将成为此类科学研究的生命线（牛若峰）。

农业推广系统是联系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科技用户的桥梁，目前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薄弱环节。加强农业推广工作，增强其服务动力、活力和效能，是加速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坚持不懈地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则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长效基础。为此，必须加强成年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着重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新一代农民技术骨干。舍此，就不能加速农业技术进步，所谓农业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朱希刚等）。

有研究认为，不断增加对农业开发的投入包括外资投入，尤其是不断增加科技、教育投

入，可以促进中国农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进而向科技——资金密集型转化。（达尼洛·托米克等）。这种趋向在经济发达的开放区已经初露端倪。

（九）不断增加对农业的开发投入

适度投入是实现农业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大陆偏低的投资水平不能维持农业的正常发展。

对农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入的停滞或减少，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就会引起农业的停滞、萎缩或衰退。研究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00—1 200 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水平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10%，台湾省在 60 年代初期农业投资水平是 18%。目前，中国大陆偏低的农业投资水平（3%左右）不足以维持农业的正常发展，投资不足是农业增长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Lorraine West，潘敏玲）。

中国大陆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内部的投资主体由原来的集体为主转变为农户，但是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也应当是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

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80 年代以来农村集体和农户的投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化倾向，大部分农村出现农户对消费性固定资产（主要是盖房）投资迅猛增长和部分农户浪费性花费过大的倾向（Lorraine West，潘敏玲等），再加上国家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稳定或比例下降，致使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的状况依然令人担忧。

从大陆和台湾的经验看，稳定的货币，利农的金融政策和支农的投资政策，是保证农业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的宏观政策。健全有效的农业金融体系及其功能的强化，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诱导农户合理利用资金，从而增加收入的极为重要的一环，甚至是影响农业振衰起敝的关键一环（李洪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功能实力的农业保险，是帮助农民有力地防范自然的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必不可少的防范保障体系。健全有效的农业保险体系对于保障农业投资安全，保证农业稳定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大陆，加强农业保险这一薄弱环节，无疑是增进农业稳定性的重要政策举措（叶祥馨）。

（十）农民增收的源泉在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实施正确的政策

农民的收入问题一直是农业经济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增加收入是农户所追求的经营目标，也是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安希伋、柯炳生）。无论大陆和台湾，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与政策演变和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显示出每个阶段都有影响农户收入消长的主要因素（罗明哲）。

追求农户与非农户收入分配均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从经验角度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台湾实行分散的工业化战略，给了土地较少的农业人口较多在工厂从业或兼业的机会，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彭作奎等）。大陆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亦应逐步实现农户与非农户收入大体上均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大的比例来自非农产业的发展，农业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尤其低粮价政策的影响对农民逐步丧失生产诱因（许文富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分析价格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时，必须注意边际价格变动。因为诱导农民行为变动的是边际价格的消长，而不是价格水平变幅的大小。由于农业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制约着农户总体效率的提高，因此今后农户（含兼业户）收入的增长将更加有赖于产业间和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和技术进步（段应碧等）。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农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别呈现拉大趋势，——一个极为敏感的经济社会问题摆在国人面前，不容忽视（安希伋，柯炳生）。

在中国大陆，本世纪末要从总体上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必须保证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这应当是90年代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农村发展的大潮已经显示，中国农民具有很强烈的发展追求，若仍以“温饱则安”的老眼光、低标准去安抚农民、安慰自己，显然远离时代要求。各层决策者们需要做的一件大事是，同农民一起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十一）对贫困山区应当实行两步走战略和特殊政策

农村贫困问题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经济综合症，对贫困山区应当实行两步走战略和特殊政策。

依照官方确定的绝对贫困线，中国大陆农村贫困人口约一半多分布在贫困县，不到一半分布在非贫困县。由于口径不一，研究者和政府扶贫机构对贫困人口的估测相距甚远，这不仅影响对原来贫困程度的估评，而且也影响对缓贫成就的评价。一个重要的共识是，经过几年的扶贫治理，尤其是温饱工程的实施，大陆农村贫困得到缓解，现在处于温饱线以下的人口多分布在环境恶劣和资源贫乏的贫困山区，这是最难脱贫的一部分人（严瑞珍）。随着中国经济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决策者必须考虑如何使粮食管理体制适应新的情况，国家应当继续承担稳定贫困地区粮食生产和消费的责任（Albert Park 等）。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差异很大，经验证明，必须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缓贫战略和不同的资源利用模式，方能奏效。对于生态环境恶劣、资源禀赋不丰、封闭闭塞的山区和穷乡僻壤，要把以缓解贫困为目标的缓贫开发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分为两步走，实行不同的政策。这两个阶段目标有着本质差别，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研究表明，近期以来不同区域收入差异扩大趋势是相当快的。若是政策方面没有相应的对策和准备，这将不利于长期平衡和公平的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化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取消限制人们积极性的体制因素，而且也应考虑建立更加完善和适宜的再分配体系，以促进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组的经济的发展（王卫平等）。应当承认，贫困山区人民在几十年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为全社会作出了牺牲，现在该予报偿了。必须尽快取消那些与缓贫目标相悖和不利于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的粮食管理体制、生产资料供应、信贷、税收、科技、教育政策，实行一套不同于一般农区而适于山区发展的特殊政策（严瑞珍）。

从长远来看，缓解贫困必须采取综合性战略，特别是实行现代化人口控制政策。通过改变家庭经济形态，普遍实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降低子女在家庭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以至消除子女抚养老人的机制，才可有效地减少对生育子女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加上执行连续性的人口控制政策，这将是今日中国降低人口增长率之最有效的方法（陈健兴，陈志刚等）。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实行缓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发展教育、治穷治愚相结合，持之以恒，能使国家缓贫政策获得成功。

（十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

广东等地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从中外经验看，实行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是举措配套，试点先行，平稳过渡，循序渐进。

首先，必须创造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产权明晰，资源自由流动，农民联合自助，政府合理干预。同时，加速市场（设施、组织、法规、信息）体系建设，保证自由进入，平等竞争。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两个市场和双轨价格，实际上变成了混合经济，为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了一些准备。

广东农村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围绕着“包、放、调、专、联”五个方面进行，比其他省市区“先走一步”。到1985年全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准备进行改革时，在广东只有5种农产品仍受政府控制。到1991年，只有稻米、烟草和蔗糖实行计划控制。1992年春天，这三种产品全部实现了市场化。这就标志着广东农产品的市场化过程已经完成。与此同时，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也逐步形成，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及国际市场紧密衔接；初级市场、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农村市场和都市市场网络成型并逐步完善。至此，广东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架已经基本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广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高速度增长，加速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当年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广东农村如今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证明，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温思美）。

随着国内统一计划调拨体制和分区产销平衡运转制度退出经济舞台，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可能成为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相结合的一种具体组织形式，也是中国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环节。当前，最重要的是进行现货交易的批发市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实行支持价格困难较多，因此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和市场环境创办粮食期货市场，从而分解和转移价格风险（吴硕）。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台湾农产品运销政策导向和目标发生了重大转折：1970年以前，农产品运销计划主要是消费者导向，其目的是以较低产的价格充分提供人民所需的粮食。80年代以来，一般学者都认为乡村居民收入偏低可能成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之负面因素。鉴此，运销政策乃改以维持合理的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为目标，相关政策和计划乃更具生产者导向的特点。这些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获实现。然而，实际经济生活所面临的选择是互相矛盾的。在各种不同利益关系中找出可以接受的平衡点，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陈新友）。

从90年代初这几年的经验看，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阶段，如下两点至关重要：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生产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平衡，越来越成为我国农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另一方面政府采用法规、政策和经济手段，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是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稳定增长，是政府宏观调控和一切农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越是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越是必须实行农业保护政策，这不是对农民的恩赐，而是为着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牛若峰）。

我们看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落后成了妨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一个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的国家，总是有其完善的运输系统，而一个完善的运输系统反过来能很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落实比较利益的经营效果。两者相辅相成，有着良性互动的关系。如果中国的运输系统的发展不是如此的滞后，那末，中国有可能不过分强调粮食区域自给，从而区域生产专业化程度和比较利益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实现程度或许是另一番景象（李天

宝等)。

(十三) 发展对外贸易, 发挥比较优势, 以质取胜

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发展对外贸易关键在于改革贸易体制,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以质取胜。

研究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业贸易的增长, 而农业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加速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互为因果(钟甫宁)。作为发展中国家, 实行积极促进贸易的政策, 巧妙利用国际市场机制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选择刺激出口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 同经济成本较高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 可以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格局, 中国政府强调“全方位对外开放”, 提出“沿海、沿江、沿边”新战略, 实为加速对外经贸发展之良策。成功的关键是: 快速反应, 灵活策略, 精细组织, 发挥优势。如果有关方面对新的机遇反应迟钝, 动作迟缓, 颇多障碍不能及时排除, 或者缺乏有效的组织工作, 也可能丧失良机。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或变动都将在国际上产生互动效应。有的研究假设了如下三种情况: 如果全球进行部分的贸易改革, 将改善中国的农产品贸易, 并将增加供给和减少进口需求,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自给率。如果全球进行彻底的多边贸易改革, 发展趋势与部分贸易改革相同, 但效益更佳。如果仅中国单方面进行价格改革, 将刺激中国的农业生产, 增加全球供给, 从而导致全世界农产品价格下降。总的来看, 这三种情况的改革都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进一步改善农产品贸易平衡, 农村实际收入将有大的提高。若实行两种情况的改革, 到 2002 年, 中国将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假设中国进行单方面的价格改革, 可使中国经济获得世界农业贸易市场的地位。中国实行彻底的价格改革, 将对世界农业价格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而言, 实行全球多边贸易改革比单独一个国家进行改革, 其获得的利益更大。如果中国不进行内部的价格改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策维持不变, 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粮食进口国。可见, 中国要实现粮食自给目标, 进行贸易政策和价格改革是必不可少的(Lan Goldin 等)。

有研究表明, 如果中国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 改革外汇汇率体制, 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外贸的长期发展, 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的自给率(Christopher Findlay 等)。如果中国实行政策改革, 同时改革耗粮型肉食消费模式, 将能缓解谷物需求压力, 使粮食自给率提高到 101%, 变成净出口国, 并将增加贸易收入(波莱温·狄一克西特, 黄淑瑛)。随着中国农业贸易更加开放, 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增加, 中国在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中必将获得较多的潜在利益(罗伯特·L·汤普森)。

现在的国际市场离完全的竞争相去甚远, 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取决于几个贸易大国的行动。我国复入关贸总协定以后, 国际市场基本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要在这样的市场上进行竞争, 必须改革贸易管理体制, 采取统一对外的竞争策略。通过适当形式协调生产、销售、进口与出口。可供选择的方式是建立生产者联合销售组织, 并把农民自己的营销组织放在首位(钟甫宁)。

就大陆而言, 非常重要的是对农村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贸易开放政策, 要取消对农村企业带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和过多过死的限制, 扩大农村企业对出口农副产品及其他出口产品的加工制作范围, 给农村企业对外适销商品以直接出口权和出口配额。国家和地方外贸机构, 要